

载《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2010 科普理论国际论坛暨第十七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普研究所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

对共识会议之“共识”的反思

刘兵 江洋

摘要：论文从共识会议中“共识”形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对共识会议的基本理念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共识会议中应具有“非共识”意识的主张。第一，提出应对“共识”这一概念进行重新阐释。“共识”的形成，不是对公众意见的同一化过程，而是对公众意见的凝练和提升过程。第二，提出应该强调为了“社会理性”的“非共识”。尊重并强调持有不同视角和立场的公众的不同意见，有利于建立更完善的社会理性，对日益放大的科学理性起到制衡和修正的作用。第三，提出应该强调为了“多元价值”的“非共识”。在共识会议中，持有不同立场的公众，表现出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态度，促使围绕着争议性科学技术问题的不同伦理和价值观得以凸显。在今天强调多元化的社会中，这种多元伦理和价值观的体现和展示是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共识会议，非共识，公众，多元价值

1. 引言

“缺失模型”之后的科学传播研究，有一个显著的趋势，即对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对话”的强烈呼吁，在世界范围内，“对话”已经成为整个科学传播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与此相应，“公众参与科学”取代了“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各国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到很多公众参与科学的尝试，既有自上而下的，例如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科学商店；也有自下而上的，例如来自不同兴趣小组的外行专家、绿色和平组织或其他公共团体的活动。^[1]这些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在一些国家，公众的参与已经对科技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对话”和“参与”成为科学传播理论界及实践界关注的核心概念，并代表了科学传播发展的主流趋势时，一些学者也对此提出了质疑：科学家与公众的对话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公众参与的实质？科学技术争议背后隐藏的科学体制的

权力结构、对话中的话语体系、公众的意见和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这些真正影响着公众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公众在科技决策中作用的因素，仅仅通过表面上的对话和参与能够解决吗？

本文选取公众参与科学的重要实践形式“共识会议”为考察对象，对共识会议中“共识”形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和反思，由此尝试提出以“非共识”意识看待和发展共识会议的新主张。

2. 共识会议的产生、发展及特点

20世纪70年代末，技术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的公众参与在欧洲受到广泛关注。传统的技术评估和公众科技政策决策，主要由以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中心形成的专家集团来主导，随着70年代以核能、环境和信息技术等问题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问题与社会的发展之间形成一种越来越巨大的张力，公众开始要求参与到这些新技术之社会影响的评估中去。另一方面，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家也越来越需要公众的支持。科学技术在当今已经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一个新技术的研究项目，往往需要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以及产生的效益，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只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才可能顺利启动并得以持续进行。除此之外，来自STS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促使人们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使人们从观念上打破了科学绝对客观的神话；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使公众与科学共同体、政府之间就科学技术问题建立平等对话关系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和必要。^[2]在这种背景下，“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作为公众参与技术评估的一种新形式，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丹麦诞生了。此后，共识会议迅速遍及法国、荷兰、挪威、瑞士、德国、英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中国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相继引入并召开了“共识会议”，2008年11月，我国也在北京召开了以“转基因食品”为议题的第一次试行性的共识会议。

“所谓共识会议，就是针对涉及到政治、社会利益关系并存在争议的科学技术问题，由公众的代表组成团体向专家提出疑问，通过双方的交流和讨论，形成共识，然后召开记者会，把最终意见公开发表的会议形式。”^[3]由此，共识会议的特点可概括为争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公众担任主要角色，专家与非专家的对话协商，信息即时公开，可能影响政府科技政策。相比以前的技术评估方式，共识会议最鲜明

的特点就是公众的参与以及主导性地位。在共识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专家的参与非常有限，只负责为公众介绍相关的知识背景，回答公众的提问，为最后的公众提案做一些技术上表述上的修改，共识会议中重要的环节，包括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协商，公众内部的讨论，以及最终报告的撰写，都是由公众主导或由公众独立来完成的。

3. 迄今为止对共识会议的批判

共识会议诞生以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被视为公众参与商讨制定科学技术相关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典范。在有的国家，某些共识会议结果——公众提案已经直接影响了政府的相关科技决策。尽管如此，来自学界的质疑和批判从未间断。迄今为止，这些批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共识会议”中达成的“共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质疑，例如美国学者谢拉·贾森诺夫（Sheila Jasanoff）曾提出共识会议至少可能存在四个问题：

- （1）过早形成共识：没有进行充分讨论而过早形成共识；
- （2）虚假共识：对参与者进行限制以形成共识；
- （3）由不恰当的参与者形成共识：理应参与的当事者并未参与而形成共识；
- （4）暂时的共识：在某一时刻形成了合理共识，随着事态、价值观、知识等发生变化，这种共识丧失了合理性。^[4]

另一类批判集中于共识会议的有效性。例如日本 STS 界学者金森修认为，共识会议这种形式看似精彩，但容易流于表面化，往往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几十位公众参与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讨论得兴高采烈，受益的只有这些少数的参与者，会议之外很少有人知晓，对社会、对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不了真正的影响。^[5] 共识会议的有效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较大差异。正如国内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共识会议对技术决策的影响因其所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如丹麦共识会议受到直属丹麦国会的技术委员会的支持和配合，其报告直接提交国会，可以对技术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而美国的共识会议虽得到地方研究所的配合和私人基金会以及大学的支持，但未正式与任何官方决策实体相联系，因而对技术决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6]

4. 对共识会议之“共识”的反思

尽管这些批判不乏尖锐之见，但是不难看出，它们都建立在肯定共识会议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即认为通过专家和公众的对话以及公众内部的讨论，是应该并且可以达成共识的，并且，这种由公众达成共识的方式有助于公众参与技术评估及相应的科技决策。至于共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从整体上来说，属于实践中的技术性问题，通过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努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

然而，在共识会议诞生 25 年之后，当我们用 STS 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共识会议，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日渐凸显出来，共识会议的基本理念是经得起推敲和反思的吗？以下从共识会议中“共识”形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真正的“共识”是可能的吗？共识会议的基本程序是，首先针对议题，由科学技术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向公众代表进行相关知识和情况的说明，并回答公众代表的提问，然后由公众代表进行分组讨论，最后由公众代表达成共识并形成公众提案。需要指出的是，在标准情况下，公众代表是通过公开募集自愿应征而来的，他们拥有不同的自然属性、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参与的目的、持有的观点和立场也自然不同。由这些通过随机性机制入选的公众个体临时组成公众代表集团，在短短一至两周内，就某个争议性问题达成共识，这是能够实现的吗？

2004 年，哥伦比亚做了一次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公众认识度调查^[7]，以首都波哥大的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转基因食品的联想词汇，来调查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印象和认识，这些词汇有“人工物”、“合成物”、“实验制品”、“克隆产品”等，以及在这些词汇基础上的开放选项。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准确并丰富地运用词汇表达对转基因食品的印象和认识。例如，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对转基因食品一词的理解，集中于“食物”等简单意向，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能够较准确地使用“基因重组”等词汇来表达对转基因食品的理解。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实际上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待有争议的科学技术理解和态度。

除受教育程度外，公众代表的年龄、性别、讨论的问题对象与自身的利益相关度，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公众对待争议性问题的理解和态度有所不同。

在这种意义上，在共识会议所能提供的有限时间和有限条件下，持有不同背景和立场的公众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共识的。所谓“共识”，必定是妥协的产物。

其次，“共识”是必要的吗？为什么一定要达成共识？这与科学共同体的结构模式直接相关。自科学革命诞生以来，“共识”一直是科学共同体内在结构的一个基本原则。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内部都要形成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具体体现在科学实际活动中一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这种模型或模式即“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可以肯定的是，范式首先是科学共同体的共识。

当今的科学体制越来越强调共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学会制度、论文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化，在评审制度、财务制度、资金分配等机制的作用下，科学共同体已经日渐形成一种共识结构。在这种共识结构下，如果有科学家对“共识”提出挑战，就会受到制约甚至惩罚。正如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所指出的，这种共识结构实际上是科学界内部一种霸权的体现。^[8]

这种共识结构反映到科学传播领域，在一个方面即表现为近年来各国对共识会议的重视和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共识会议这种看似民主的公众参与形式，实际上是科学界的霸权意识在公众参与科学技术问题上的体现，是对公众权力的一种侵犯。在开放、平等、互动的科学传播理念下，公众针对有争议的科学技术问题，并非有必要总是以达成共识为第一目标，在争议中形成并保持个人意见同样可以成为是共识会议的重要价值之一。

5. 结论

5.1 “共识”之概念的重新阐释

共识会议中的“共识”二字，往往容易引起一种误解，认为共识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公众中达成共识。实际上，应该对“共识”二字做出明辩。所谓“共识”，并不是要抹平差异，追求共识的达成，而是要通过充分的讨论，使公众形成个人意见，将这些意见分类、梳理、归纳、总结，然后进行系统化和精致化的表述，这一过程，不是对公众意见的同一化过程，而是对公众意见的凝练和提升过程。

5.2 为了“社会理性”的“非共识”

公众在与专家的对话中，通常将难以理解的高度专业性词汇转换成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其意义。并且，在共识会议的讨论中，并不仅仅倾听专家的意见，也通过其他多种渠道获得信息，这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行为。换言之，作为外行的公众，用与专家不同的独特方式来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并通过这种不同于专家的独立的判断标准，得出对于科学的独立见解。这些见解，往往会指出专家忽略的问题。

在分工明细、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科学技术中，专家的视野有一种狭窄化的倾向，往往失去俯瞰、横向审视的视角。例如，针对开发新的化学物质的课题，有研究合成物的有机化学领域，有研究工业生产的应用化学和化工领域，有研究对人体影响的公共卫生学和医药学领域，有研究环境影响的生态学领域，同一个研究课题的不同方向，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在分工越来越明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下，跨越自身的专业领域，从整体上俯瞰整个问题，对于某个领域内的专家来说，常常是很难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社会和公众的视角就更加必要。公众作为科学技术问题的外行，站在专家集团的外部，从整体上宏观看待这一问题，为科学研究在科学理性之外，注入社会理性。

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放弃在公众中达成共识的目标，尊重并强调持有不同视角和立场的公众的不同意见，有利于建立更完善的社会理性，对日益放大的科学理性起到制衡和修正的作用。

5.3 为了“多元价值”的“非共识”

参加共识会议的公众，通常从个人的角度提出意见，在专家看来，这种意见因为没有建立在基本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仅仅是一种情绪化、感性化的反应。然而，这种个人化的意见，至少能够反映出对争议性科学技术问题认识的一个侧面。争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除了科学本身安全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争议外，也直接冲击到伦理与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的价值与实践发展，也就是说，争议性科学技术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已扩大了科学、环境、社会、伦理、政治等多个领域。

在共识会议中，持有不同立场的公众，面对这些争议性问题，表现出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态度，这促使围绕着科学技术问题的不同伦理和价值观得以凸显。在今天

强调多元化的社会中，这种多元伦理和价值观的体现和展示是不可缺少的，也是我们在组织和应用共识会议时所必须采取的立场。

参考文献：

- [1]彼得·布洛克斯. 理解科学[M]. 李曦, 译.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120-122
- [2]刘锦春. 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模式：欧洲共识会议的起源及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 23 (2) : 84-88
- [3] Simon Joss , John Durant. Consensus Conferences: A Review of the Danish, Dutch and UK Approaches to this Special Form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Options for a Proposed Swiss Consensus Conferences[M]. The Science Library , 1994:195-204
- [4]金森修, 中岛秀人. 科学論の現在[M]. 東京:劲草書房, 2002:138
- [5]金森修. 本文作者对金森修的访谈[Z]. 北京友谊宾馆, 2005. 7. 26.
- [6]刘馥琰. 西方共识会议制度的本质探索[J]. 科普研究, 2008 (4) :39-43
- [7]CARLOS JOSÉ PARALES-QUENZA.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once again:Germinal elements in the public percept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Colombia[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4, 13(2):131-153
- [8]Steve Fuller. dissent over descent[M]. Icon Books, 2008:1-5

作者简介

刘兵：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文化传播，电子邮件：liubing@tsinghua.edu.cn，通信地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100084

江洋：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传播，电子邮件：pilot29@163.com，通信地址：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100081

